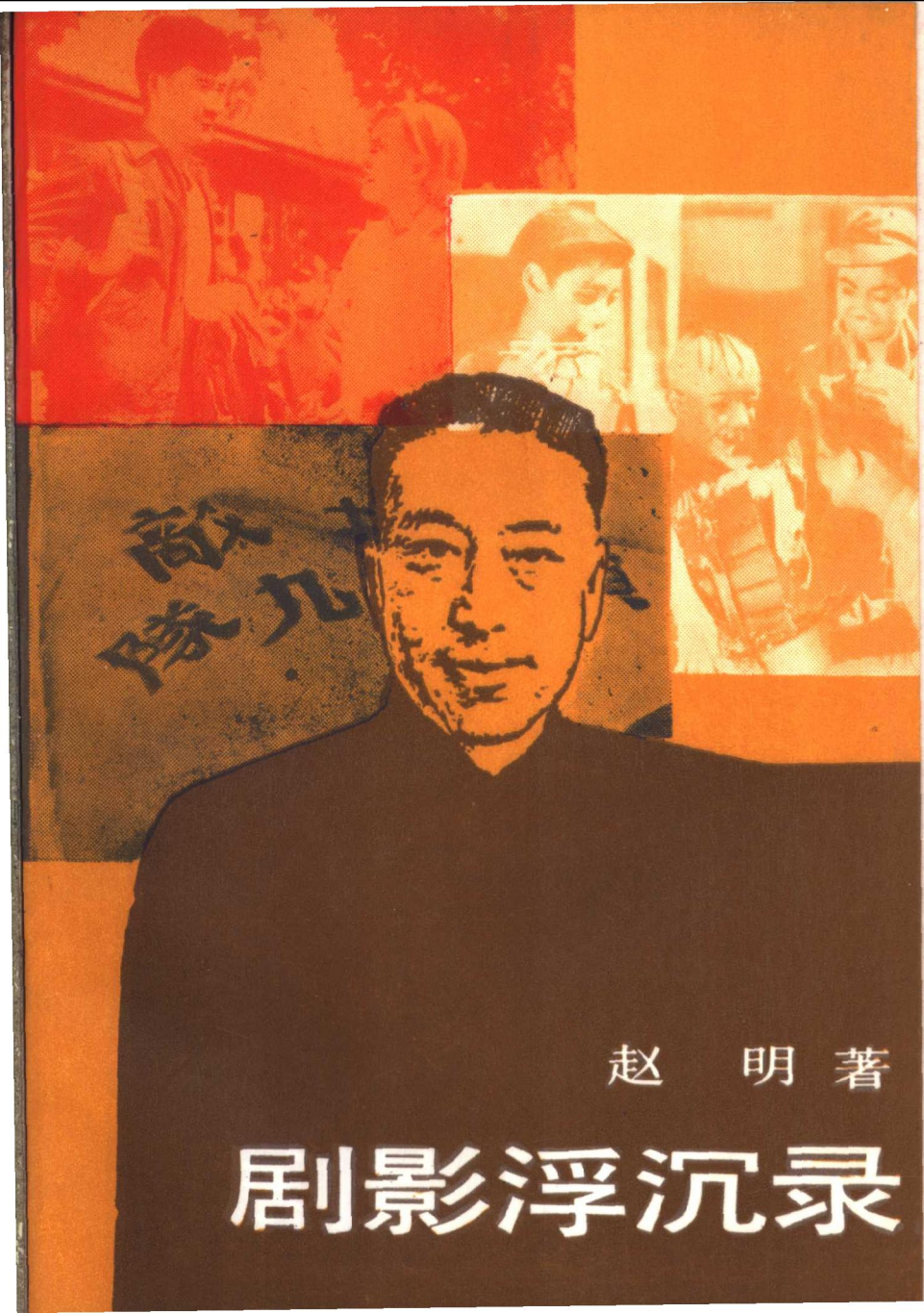




赵 明 著

剧影沉浮录

剧影浮沉录

赵 明 著

文 津 出 版 社

剧影浮沉录

Ju Ying Fu Chen Lu

赵明 著

*

文津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昌平马池口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26,000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70

ISBN 7-80554-069-1/I·22

定价: 2.65元

自序

回顾我的一生，作为一个普通的文艺工作者，有二十多年的历史是我终身难忘的。这二十多年的前十多年，是抗日战争及其前后时期在演剧队从事戏剧活动的阶段，后十多年是全国解放后在电影界从事电影创作（主要是导演）的阶段。这两个阶段在一个人的生命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我个人平凡的生活经历中却具有不平凡的意义。特别是前十多年的演剧生活常使我念念不忘。1984年，我从电影学院离休下来，由于生活空虚，同时由于许多前辈在这一方面的启发，我就想起了试写一篇回忆录，一方面用以破除寂寞，一方面也可以记录下这段往事，以资纪念，于是我就开始陆续写作了。此后不久，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史研究室的同志来找我约稿，他们准备出一个集子，要我根据本人建国以来所从事电影创作写一些总结性的文章，供他们选编采用。于是我便首先拨出时间投入这项任务，意图从过去十多年的电影创作实践中汲取一些经验和教训；可是总结经验谈何容易，一方面自己的实践经验不多，理论水平有限，一方面材料也欠缺，没有办法，只好把我过去写过的一些旧稿拿出来，重新加以整理，凑成一篇《回顾我的电影创作》，聊以塞责。没有想到稿子被编者采用，而且已经发排，更没有想到经过一段时间，不知由于什么原因，该刊物竟没有出版，于是我这篇抽稿只能保留一份复印件，“束之高阁”了。

1986年，为筹备于1988年举行一次演剧队建队50周年纪念活动，开始征集稿件，准备出版一些纪念刊物，这时我的回忆录上篇《难忘的演剧生活》已经脱稿，九队刊物编委会的同志传看了我的原稿都认为可用，但篇幅太长，只能选用若干章节，亦须在字数有限的篇幅范围内首先发表。于是我就选出了其中的若干章供他们采用，这些已见1988年8月出版的九队回忆录《八千里路云和月》一书，在演剧队以及有关部门内部发行。这一部分稿件发表后，很得到一些同志的赞许与鼓励，好心的同志希望能有机会全文发表，但是全文发表，哪有这样理想的机会呢？因为本人既非著名的文人，又非专家学者，出版社是不屑问津的。这样，这一部稿件和它的下篇《回顾我的电影创作》也只能再搁置起来。

今年（1990），偶然的的机会得知文津出版社可以接受作者的自费出版，这无异是个福音，因为自费固然有一定的困难，但这毕竟是一条生路，可望有出版的机会了。于是征得文津出版社的同意，并得到优惠待遇，决定以《剧影浮沉录》的书名出版。至于为什么取这个书名，我想大概不用解释，因为我在剧影界的创作活动历史虽不长，但在戏剧和电影的海洋里也算浮沉过一番。

希望这本小册子能得到专家、学者，以及合作过的同志们的指教！

1990年4月



作者近照

目 次

上篇：难忘的演剧生活

一、最初的接触·····	(3)
二、美专剧团·····	(5)
三、第一次被捕·····	(8)
四、在南京民众教育馆·····	(11)
五、狱中生活·····	(13)
六、重返上海 影剧两栖·····	(20)
七、从《保卫芦沟桥》到救亡演剧队·····	(23)
八、抗敌剧团沿江西上·····	(26)
九、沸腾的武汉·····	(29)
十、徐州突围·····	(30)
十一、长沙归队·····	(37)
十二、大火与救灾·····	(40)
十三、“服务第一”还是“演剧第一”？·····	(42)
十四、“战场乐府”·····	(44)
十五、袁水之滨·····	(46)
十六、两赴湘北前线·····	(48)
十七、《一年间》的排演·····	(55)
十八、《胜利进行曲》·····	(58)
十九、“甄别”与监视·····	(61)

二十、从湘北到赣北·····	(64)
二十一、《愁城记》的排演·····	(66)
二十二、严酷的考验·····	(71)
二十三、病休生活散记·····	(80)
二十四、《杏花·春雨·江南》·····	(87)
二十五、参加西南剧展·····	(90)
二十六、难忘的革命友谊·····	(98)
二十七、山城印象·····	(103)
二十八、在綦江和万县·····	(106)
二十九、重返武汉·····	(109)
三十、《丽人行》及其它·····	(112)

下篇：回顾我的电影创作

一、不懈的探索·····	(123)
二、我当电影学徒的时候·····	(124)
三、处女作：《三毛流浪记》——从漫画到电影 ·····	(128)
四、独立拍片第一部：《团结起来到明天》—— 一次重大的试炼·····	(133)
五、《铁道游击队》——从小说到电影·····	(139)
六、《凤凰之歌》——追求独特风格中的偏差与 失误·····	(147)
七、《绿洲凯歌》——建国十周年献礼片，又一 次新的探索·····	(153)
八、《年青的一代》——从话剧到电影·····	(166)

上 篇

难忘的演剧生活

一、最初的接触

我自幼生长在苏北扬州东乡大桥镇。祖籍镇江，是祖辈在太平天国时期迁移到这个镇上来的。我从小读私塾，对新文化艺术可以说是一无所知。镇上每年往往有一次徽班京剧演出，那是在广场上临时搭置的“草台”，观众或立在广场或坐在花钱置座的看台上，我就随家人这么欣赏过多次，受到最初的艺术熏陶。话剧（当时称文明戏）看到过一次，那是在庙堂演出，我除了感到新鲜之外，没有什么印象。电影也看到过一次，只见人物活动，都是些片段，没有什么剧情。印象比较深的还是京剧，我曾在课桌的抽屉里布置过假定的舞台，用彩纸剪贴成京剧服装，套在手指上表演武打场面，当然是很拙稚可笑的。

此外，我在幼年对绘画就较早感到兴趣，常常临摹《芥子园画谱》和偶尔见到的山水画，都是依样画葫芦，无师自学。我所在的私塾老师曾让我画了一张“中堂”，贴在课堂里，因而我就被认为是一个“小小画家”。

也许，这些就是我幼小心灵里的艺术种子吧？

我的演剧生活是从1933年在上海正式开始的。在那以前曾和话剧有些接触，主要是做为观众和读者，接受了若干启蒙教育。如上海戏剧学社演出的《威尼斯商人》，复旦剧社演出的《西哈诺》，还有中国旅行剧团演出的《雷雨》、《日出》等和某些有关的剧本，都曾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当时我是一个十几岁的学生，除了爱看电影就爱看话剧，当然看话剧的机会并不多，但每看一出，就为其中的情节和艺术形象所激动，像对某些美国电影及其中的影星一样，深为感

佩。当时国内著名的话剧演员袁牧之、唐槐秋等我就比较熟悉了。

我接触进步戏剧，开始是偶然的，间接的。1931年我在一个储蓄会当练习生的时候，利用夜晚的时间，在白鹅绘画研究所学习西画，在那里结识了两位进步同学，看了一些进步书刊，如左联的《文艺新闻》和南国社的《南国》杂志，我看得比较多，对于文艺界的革命文艺活动和南国社的戏剧活动，包括对田汉同志其人，印象都比较深刻。鲁迅先生的小说《呐喊》和夏衍（沈端先）的《包身工》就是在那个时期阅读的。限于自己的觉悟水平低，当时对于这些作品的意义还不甚了了。但，《文艺新闻》的被查封，南国社的被解散，这我是从同学的传闻中知道的。

大概是1932年秋天，我从报纸上看到有一个“人本剧团”招收学员，我不了解情况就去报名参加了。剧团负责人许啸天是何许人也，我不清楚，只知道他是一张文学小报《红叶》的主编，在旧文艺界似乎小有名气。剧团开学后，学员一共不足二十人，大部分是男的，只有两个是女的，是姊妹俩。男学员中有赵默（即金山），姚时晓，吴琛，孟浪等，我和他们初次见面就比较接近。许啸天规定学员须经过一段时期学习才能排戏演出，这一点我们很不满足。教戏的是一位操四川口音的老师，我忘了他的姓名了，教唱的是比较著名的陈歌辛，曾教会我们唱一个曲子。另外在教师名单中还有一位教师，好像是陈大悲，我印象中他没有给我们上过什么课。开学不久，剧团安排我们排一个翻译过来的独幕剧《女人与法律》，我和金山、姚时晓等认为没有意思，就在课余时间，深夜排演反映上海工人斗争的《工场夜景》，打算找机会参加演出。这事被许啸天知道以后就大为震怒，

横加制止。于是我们几个人——金山、姚时晓、吴琛、孟浪和我就退出“人本剧团”，另行组织剧社，开始从事进步演剧活动。1933年初成立的三三剧社和后来的光光剧社都有我们的足迹。

二、美专剧团

1933年秋，我借了在白鹅绘画研究所学习美术的一点底子，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选科二年级，继续学习西画。学校有个美专剧团，过去公演过多幕剧《C夫人肖像》，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赵丹就是通过演这个戏而受到影剧界注意的。当时剧团的负责人是王为一，实际担任指导的是徐韬，他是美专的老同学，是代表“左翼剧联”来搞组织领导工作的。剧团的成员除徐韬、王为一和我外，还有何康理、鲁夫、魏曼飞、谢武潮、姚展、王积绪、鲁延祺、王素（女，王昆仑的妹妹，原为南国社的演员）、王紫萍（女）、徐悟音（女）、柳爱竹（女）、汪清（女）等，共有二、三十个同学，当时我们都很年轻，也很幼稚，参加党所领导下的左翼戏剧活动，就凭一股热情，行动中有“左”倾盲动的情绪，不是很策略，可是那种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敢作敢为的革命精神，还是很可贵的。

当时我们演出的第一个剧目也是多次演出的保留剧目《月亮上升》，曾在沪西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北郊上海法学院等地巡回演出，由于剧中歌颂了一个革命者的勇敢机智，同时暴露了伪警察的愚蠢，就遭到反动当局的忌恨和特务学生的破坏、捣乱，在校内校外，斗争都是十分激烈的。有一次剧团开会，选举演出委员，反动学生因争夺领导权不

得，就蓄意破坏，竟有组织有计划地挑起一场殴斗，毒打了我们剧团的骨干分子鲁夫同学，把这次会议搞散。后来这一事件引起了全校同学的公愤，召开各省同学的同乡会（这是学生群众的一种组织形式），伸张了正义，支持了鲁夫同学所属的山东同学会，孤立了少数反动学生，使剧团的进步势力取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校外的斗争更加激烈。在上海法学院的那次演出，我们又遭到该校特务学生的殴打。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那次演出一共有四个独幕剧，当第二个剧目《月亮上升》刚演完不久，第三个剧目正在上演时，有人来找王为一（他在《月亮上升》中演革命者，我演警长），那人在台口旁边阶梯上一见王为一，劈头就问：“你演这个戏多少次了！为什么尽演这个？！”接着不由分说，动手就打，同时台下有一群学生就以“铲同志会”的名义散发传单，冲上舞台，见人就打，见物就毁，顷刻之间，台上台下便一片混乱！我们当时毫无防备，只好退出舞台，在该校教务长沈钧儒先生掩护下，从后台跑到后面教员宿舍暂时躲避，等到剧场的纷乱平息了，才由该校派车把我们护送出去。临行，沈老先生还一再和我们每个人握手道歉。在这次事件中，我们剧团的一个同学谢武潮被捕了，他当时坐在剧场看戏，并未演戏，只是由于他亲眼目睹特务学生的蛮横破坏，当一批伪警前来现场“维持秩序”时，他当场指认凶手，不料竟被那些可恶的打手反咬一口，反被逮去了。后来听说谢武潮被从伪警察局解送到龙华监狱，一直没有下落，很可能已经蒙冤牺牲。在那段黑暗时期，柔石、胡也频等五烈士的牺牲，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其实，在整个左翼文化运动中，光荣牺牲的无名战士不知有多少！

美专剧团在上海法学院挨打后，王为一不能再在美专待下去，就离开剧团，暂时隐蔽起来了。不久，我由徐韬介绍，参加了左翼剧联，并负责搞了一次美专剧团的正式公演，时间是1934年初春。公演前，学校一负责人找我谈话，说是“法捕房（学校的所在地属法租界）已经来人把你们剧团的名单抄去，你们不能再进行演剧，要赶快停止活动。”我们当时根本不管这些，我说：“我们有演出委员会负责，我个人管不了。”还是照样继续准备公演，进行紧张的排练。演出费是从那里来的呢？大家自己掏腰包，向亲友募捐，兜售戏票；甚至“脱裤子当当”，真是饿着肚子也要干，就有那么一股苦干穷干的精神。

公演剧目有四个：《银包》、《叛徒》、《谁是朋友》、《婴儿杀戮》。是请应云卫先生出面，并有上海戏剧协社的冷波、沈潼、黄瑛来帮助导演的。演出场所是西藏路宁波同乡会或湖社，这已记不清楚了。校内的反动学生曾扬言要在我们公演时施加破坏，我们没有理会。为了接受已往的经验教训，这次地下党和“剧联”组织上采取了一些防卫措施，派来了一些工人赤卫队员，据说是江南造船厂的老工人，带着武器，暗暗保护我们。我们也比较策略地特别邀请了学校负责人前来“指导”，一场隐伏着危机的演出总算没有出任何事故，比较顺利地进行了。我当时作为这次公演的负责人，又是主要演员之一，真是心里捏着一把汗！

演出虽安全过去，可是危机并没有消除，就在下个学期开学之前，我们剧团的几个主要骨干被学校开除了。开除没有什么可怕，因为我们这时已热爱上革命戏剧，对原来所学的专业，比如我吧，已把绘画抛在一边，兴趣已经转移了。于是我们就在学校对面的一个弄堂里租了一间统楼，继续排

戏，继续在校外参加流动演出，仍然进行革命的演剧活动。那时“剧联”用“无名剧人协会”的名义组织了一个“星期小剧场”演出，每逢星期日上午，利用电影院的空隙（那时上海电影院不放早场电影，场租较低）进行话剧公演。我们剧团的成员，其中有被开除的同学，也有没被开除的同学，仍然团结在一起，参加这样的“星期小剧场”演出，在九星大戏院演出过《洗衣老板与诗人》，在光华大戏院也参加演出过。

作为一个学校剧团，我们还到工厂、农村演出，有时不以剧团的名义，而是个别参加“剧联”组织的“兰衣剧社”活动。我就曾在沪西工厂区上海女青年会办的女工夜校给女工们排过戏，并带她们到工厂、农村演出。我帮她们排的剧目主要是田汉的《梅雨》。工人热情很高，干劲很足，白天上工，晚上排戏，到深更半夜也不觉得疲倦，我当时白天在上海三和出版社当美术编辑，夜间有时就住在她们那里。那时，左翼剧联领导下的演剧活动，可以说已走上为工农服务的道路了。

三、第一次被捕

1934年4月间，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我们进行了一次冒险的演出活动，那是在上海南市中华路共和大戏院。平时我们演出的场所多半是在租界（去农村例外），这次去的共和大戏院是在华界，到那里去演出，等于是送到虎口里去，危险性是相当大的。那次演出带有“飞行集会”的性质，在电影院放映电影之前，加演两个独幕剧，其中一个《锁着的箱子》是我们美专剧团的同学排演的剧目，另一个

是持中剧社的剧目，轻装简从，一共只有十来个人。美专同学有何康里、柳爱竹、魏曼飞、万声和我，持中有胡导和几个同学，胡导是他们的导演。当两剧演出刚完，我们正在卸妆时，后台来了两个人，要我们到戏院经理室去一下，当时由于我们缺乏经验，警惕性不高，虽然有些疑惑，还是跟那两个人通过剧场，走向门厅旁边的经理室去了。一进经理室才知道情况不妙，里面有好几个便衣特务，有的在打电话要车，有的拿着说明书点名，有的把着门口，显然是要拘捕我们了。当时我用的笔名是“照明”，一个特务在屋内巡视一周说：“谁是照明？”我知道我是逃不掉的，只好坦然地承认。“持中”的一个女同学看到形势不好，她就要求打电话通知家里一声，被特务阻止了，那个女同学还天真地发问：

“那我家里爸爸妈妈等我回去怎么办呢？”不多一会，剧院门口来了一辆黑色的警车，特务把我们十几个人，除了何康理一人在通过剧场时乘熄灯的机会混入观众席外，所有演出参加者两个人合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不由分说地押上警车，被送到伪公安局里一座小楼，关押了起来。小楼显然是特务机关专门关押并审讯“政治犯”的地方，每个房间都有铁栅栏门，我们走过时，里面的“犯人”都露出关怀和审视的眼光瞧着我们。他们的清瘦面貌和神态，一眼可以看出，都不是普通的“犯人”，而是革命的“难友”。就在这座小楼的楼上，我们被关在两间房里，等候审讯。大约是午夜时分，他们分几摊开始轮番审问我们了，他们的问题除一般姓名、职业，为何来演戏外，主要是两个：一个是谁是这次演出的组织者？另一个是：谁是共产党员？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我们既不知道谁是这次演出的组织者，更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当特务审问我时，我也装糊